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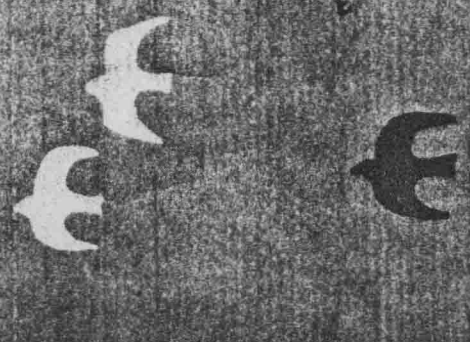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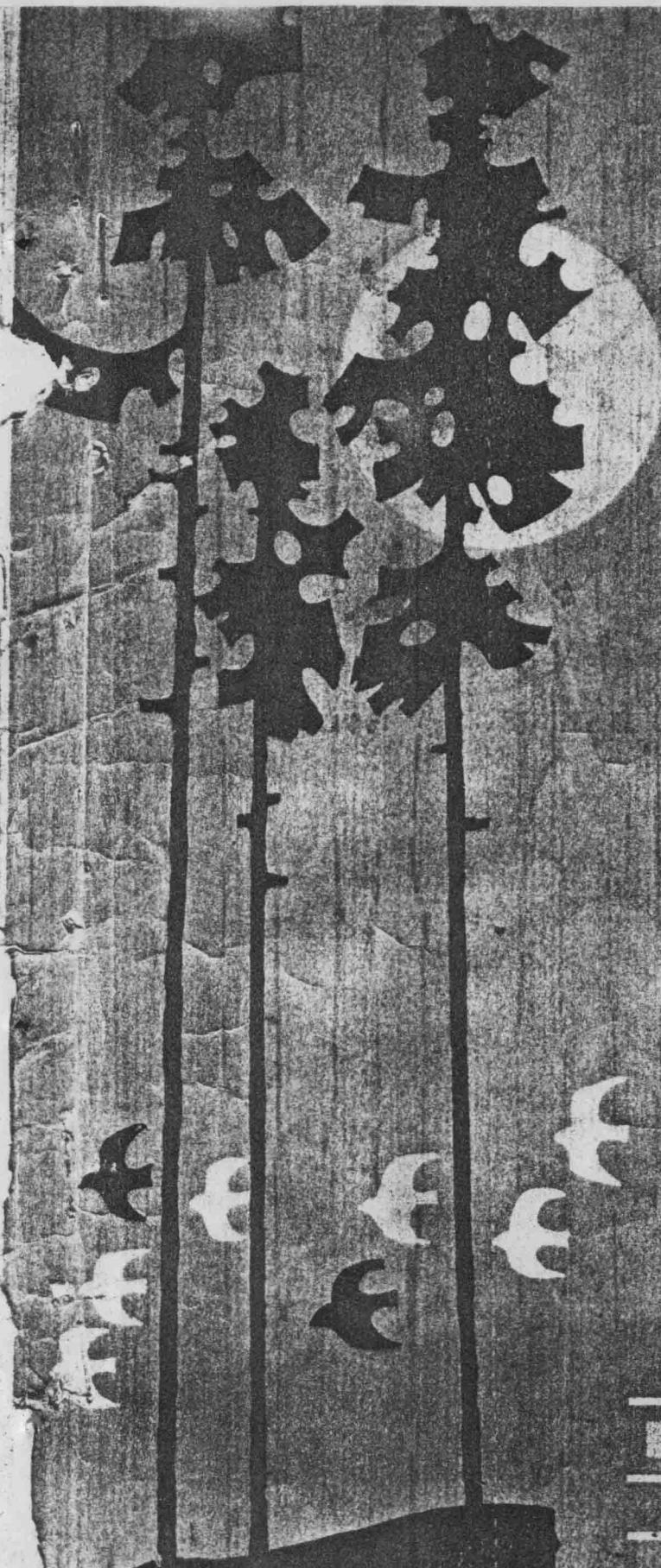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文件作者	文件上 原编字号	文件 日期	标 题	文件所在 张 号	备 考
29	王逸伦			《百柳》八一年第六期 —— 路漫漫	147	
30	郝维民			《党的教育》 “草口升起不落的太阳”	158	
31	哈拉胡代	1982年		《内蒙古日报》 “中共内蒙古特委特委”	160	
32	李铁松 内蒙特委	1930年		内蒙特委的组织及工作计划	161	
33	李铁松 刘 刚	1931年		内蒙党报告	163	
34	内蒙特委	1931年		内蒙古一般的政治经济状况	169	
35	李铁松	1932年		内蒙特委书记李铁松报告书	178	
36	内蒙特委	1932年 9.15		中国共产党内蒙特委为纪念九 一八反对帝国议进攻热河告蒙民书	189	
37	内蒙特委	1932年 11月9日		关于整顿党的组织致中央信	192	
38	“	1933. 2.22		内蒙特委三月工作计划草案	194	
39	“	1933 2.22		坚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宣言	199	
40	“	1933. 2.22		内蒙特委给热河同志义勇 军友人的指示信	201	
41	王逸伦	1933. 11月		关于内蒙特委工作报告	204	
42	郑玉烈	1930		内蒙古去年工作情形总结报告	208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文件作者	文件上 原编字号	文件 日期	标 题	文件所在 张 号	备 考
43	王逸伦		1982. 1.	关于钱逊同志革命活动证实	216	
44	"		1982. 10.	回忆陈镜湖早期革命活动	218	
45	孔 凡 王逸伦		1982. 9.	在华北五省市反党反社会主义 会议上谈钱逊同志情况(录音整理)	238	
46	惠步如		1982. 5.	钱逊同志、宋化家、杨静仁的信	251	
47	惠步如		1982. 11.	回忆陈镜湖同志	254	
48	惠步如 王逸伦		1982. 12.	补充证实陈镜湖的几个问题	287	
49	为 敬 组印		1982. 8.	关于钱逊同志为革命献身的 事迹	291	
50	崔望波			崔望波自传摘要	295	
51	孙福贤			我所知道的钱逊、陈镜湖等 同志的一些情况	300	
52	赵同生			陈镜湖在蒲城县时的情况	303	
53	蒲城县 志 办			联 查 表	308	
54	赵谨三		1933	梁哈尔抗日实录	311	
55	北京市 公安局			摘自被伪政府档案等卷 (关于钱逊同志的材料)	336	
56	白心莹		1983. 5.2	我所知道的陈镜湖	346	

百柳



1981

BAILIU





目

一九八一年第6期(总第6期)

(双月刊)



· 革命回忆录 ·

路漫漫……王逸伦忆述 震宇整理(2)

高桥的故事……何文涛 郑维家

李 侠 严存林等忆述

李书一 王振德

陈大立 搜集

李书一 整理 (49)

· 小 说 ·

太子河奇案……刘瑜 刘明德(62)

胡三老汉的“哲学”……韦 苇(20)

走出鄂博古尔沙漠……江 浩(29)

人头祭(历史小说)……怀 英(35)

队长和社长……朱文远(41)

成吉思汗的故事(中篇连载)……

原著(日本) 梅本

蒙译 玛尼扎布

汉译 那顺 原野(115)

· 新人新作 ·

社长的头三脚……沈孝华(85)

喜酒不醉人……桑 苗(90)

拜“岳父”……薛澍华(94)

春英嫂……崔长青(97)

· 前进中的昭乌达 ·

仙掌峰下攀峰人……石 云(101)

· 散 文 ·

希望的乐土……修 竹(108)

潢源记……希日布(113)

· 诗歌·诗评 ·

南海诗踪(组诗)……胡世宗(44)

太象别人就没了自己……谢 冕(46)

寄诗故乡游子情(二首)……青格里(48)

我送给你一枝山丹花……纳民夫(61)

· 民间文学 ·

没头的王爷……张国辉整理(118)

· 其 他 ·

昭盟革命回忆录专集《碧血丹心》即将出版
发行

封面设计……马德林

昭乌达风光(摄影三幅)……冯今章

白显林 杨文清(封二)

爱民曲(水印木刻两幅)……童保华(封三)

新苗茁壮(年画)……马跃武(封底)

路漫漫

王逸伦忆述

震宇整理



每当我回顾那艰难的岁月里，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我就深深地感到：革命来之不易。多少革命志士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何等艰苦的奋斗呵！由此，使我想起屈原的一句诗词：

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是在一九二六年，第二次直奉战时，军阀混战的烽火硝烟弥漫了长城内外。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鏖战方酣之际，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在前线“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而转向革命。奉、直、晋军阀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在以“讨赤为主旨”下，联合向国民军攻击。日本军舰亦抵大沽口配合，向岸上的国民军开炮轰击。在帝国主义和奉、直、晋军阀的联合压迫下，国民军只得由京津退守南口，最后朝西北这一带败退。

当时，我在赤峰二道街中学念初中，战争的烽火也波及赤峰。学校被迫停课了。有钱

的人家雇了马车把自己的学生都接回去了。我家里很穷，连我念书还供不起，更甭说雇车回家了。尽管战事很紧张，为了能抓紧时间多读一些书，我和几个同学还是留在学校里自修。

这年阳历四、五月间，正当春暖花开之际，有两个货郎打扮的买卖人，经常来我们学校。来过几次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籍贯，一个长得墩墩实实的个头，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有神的小眼睛，一脸黑乎乎的络腮胡茬子的人，名叫乌子贞；另一个长得细高个，象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名叫郭皓轩，是河北人。这两个人渐渐和我们几个学生混熟了，有几次在我住的小屋子里，点上了灯，和我们谈起了社会时局的发展和他们在世面上的见闻，讲述了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盛况，讲了军阀历年混战，民不聊生的痛苦，历数了国家处在黑暗统治的种种惨痛

的景象……

我们几个同学都瞪大眼睛听着他们的讲话，这些新鲜时事和浅显的道理，说到我们心里，象打开一扇窗户那样亮堂。每次讲到激昂之处，我们都很激动地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十分感慨地说：

“军阀混战，百姓们遭殃。当今有爱国之心的人，谁不向往光明，打倒军阀列强，国家才能有个清朗的政治。”

乌子贞和郭皓轩二人听了我的讲话，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有一次，乌子贞和我谈话时问到了我的身世，我就向他讲了我的家庭出身情况：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就是雇农。我三个哥哥给人家扛活，一家八口人住在一间半的土房里，我七、八岁时，长得个小体弱，上山放牛还圈不过来牲畜，还得我哥哥上山打接应。到了十二岁那年，我哥哥说我力弱，做不了农活，家里紧一紧，还是要供我念几天书。这样，我父亲就把我送到农村小学里去念书。教我的老师和我父亲是老交情，他很愿意教我。到了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病得很厉害，全家人节衣缩食，又借几个钱给父亲看病抓药，我也不能到学校去念书了，在家里伺候卧床不起的父亲。因为缺医少药，八、九月间，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母亲由于过度的悲伤和操劳，到冬天也去世了。

父母去世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我决意不再念书了，帮助家里做点活，来维持生活。在家里拼死拚活地干了两年零活，我哥哥看我身体实在顶不住，就对我说：

“做农活你不行，无论如何你还是把书念完，能当个小学教员，混碗饭吃就行了。”

这年秋天，我哥哥借了几个钱，又送我上赤峰高等小学念书了。在这所学校念书的富家子弟都很阔气。秋天的天气已经凉飕飕

的了，他们看我还穿着打补丁的粗布单裤单褂，都离我远远的，好象是怕我沾脏了他们的绸缎长袍，或者是怕我把身上的“穷”气贴到他们身上。看到他们这种嘲笑和高傲的神态，在我的内心里深深地打上了出身贵贱、贫富不均的烙印。我心里想，我就不相信这个世道永远是你们的。憋着这股气愤的劲头，我就拚命刻苦的学习，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慢慢地同学们都和我靠近，和我交朋友了。

学校由高等小学改成初级中学时，我还没到毕业的年级，家里又没钱再供我念书，我只好停学了。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都为我停学感到可惜，他们说：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毕业了，你这样停学多可惜呀，只要你们家同意你念书，我们帮助你，不用家里拿钱。”

就这样，我在同学和老师的资助下，勉强地继续在学校念书。

……

大胡子乌子贞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对我十分同情，鼓励我把书念完，为大革命做些事情。他又答应我毕业后送我到广东黄埔军校，或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非常高兴，这时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这时，热河和赤峰等地在京津求学的韩麟符、陈镜湖、郑丕烈、杜真生几个人都参加了共产党。有时回赤峰传播新思想，也起到了启蒙作用。从此，共产党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象点亮的一盏明灯。

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在初中将要毕业时，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经常和我联系的几位同志都离开了赤峰，从此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们的革命思想对我的启蒙和引导，在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几十年中，一直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使我终生难

忘。

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我初中毕业了。这时，独夫民贼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赤峰县城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反动统治，社会气氛变得更加沉闷了。我准备投身于革命的愿望也渺茫了，真是空怀壮志，欲投无门啊！

我们学校的杨校长，他知道我学习成绩很优异，就分配我到赤峰接官亭小学，当高等小学教员，其他同学都分配到了初等小学当教员。这当然是校长的偏爱了，也是我苦心学习的结果。我哥哥多年培养我的愿望，总算是实现了，我看到他那副愁眉苦脸也露出了笑容，一些亲戚朋友也都来恭贺。我想一个放牛娃能当上高小的教师，个人的生活总算是有了出路，可是，国家和民族仍然处在腐朽反动的统治之下，心里仍然充满了忧虑和压抑的情感。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军阀混战烽火天，萑苻遍地民倒悬。

愧我无才匡社稷，蒙君过誉倍赧颜。

面对着军阀混战、鬼蜮横行、民不聊生的景况，稍有热血的青年生不能为国分忧，死不能为民出力，怎能不扪心有愧呢？

我在赤峰接官亭学校教了三年学。这期间，曾经和我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很要好的同学张伯乔、穆松乔、赵子珍都上北京念书了，他们经常给我寄一些报纸和刊物。我从这些刊物上，了解到了一些时事新闻，接受了一些新鲜的思想，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最有意义和最感兴趣的事了。

一九三〇年将要放寒假的时候，由于反动派内战频繁，苛捐杂税繁多，物价上涨，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胜言。

这时，接官亭学校那位姓刘的校长，长时间拖欠教员的工资不给，有的教员时常断

粮断柴，教员们都很气愤。我说：

“现在眼看着要放寒假了，校长还不发给工资，这样不行，我去找他讲理去！”

有的教员说：算了，你找他讲理，他也不会给你说好听的。”

我说：“我就不听他那个邪，非和他讲理不可！”

我到了办公室里，找到了刘校长，要他把拖欠教员的工资给发下去，刘校长听了我的话，感到很不自在，他找出了很多的“理由”来搪塞拖欠工资的事。

我很气愤地说：“你讲的这些‘理由’，是没有道理的，再这样拖延下去，教员们是没有办法再去上课的。”

他听了这话后，立时就恼羞成怒，和我吵起来了。说我“不守校规”、“煽动教师闹事”，这件事打到了教育局。教育局长是当地一家姓李的开煤窑的东家，也是地方的绅士。这个人办事很狡猾，他不但不接见我们，反而传出话来说，这属于学校内部的事，要我们找人调解。

刘校长以为这件事教育局长替他撑了腰，他得了理似地洋洋得意。有的教师暗中给我传过信来说：

“刘校长要让你给他赔不是，这件事就算拉倒。你厉害着点，别怕他们。”

我说：“甭说让我给他赔不是，就是他来给我赔不是，我也不干了！”

学校的教师们对刘校长仗势欺人的卑鄙做法都非常气愤，他们都很支持我。教育局长一看这件事引起了教员们的反对，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就把刘校长叫去训斥了一顿。教育局长又用“不要为一点点小事生气，要以学业为重”等等好听的话来安抚我，把拖欠教员们的工资都给补发了。

我和刘校长的这一场斗争，虽然赢了，可是，看到学校这种混乱的局面，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死气沉沉的气氛，心里仍然气愤难

这几个学生上北京念书，马校长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那时，从林东到北京，真好比登天一样难。路上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交通很不方便，还经常出现土匪抢劫。有的同学就产生了畏难情绪，又不想去北京了，我就鼓励他们不要怕艰苦，也不要怕土匪，要有为国为民求学的坚定信心。

我们找来一个比较熟悉路途的人做向导，几个学生一人骑一匹马，我骑着一头毛驴，一起上路了。

这是一条十分艰苦的路。路上因为躲土匪，大家都跑散了。后来，又找到一起。打间住店经常遇到一些流氓、兵痞的敲榨勒索……尽管一路上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条通向光明、通向真理的路。

我们从林东整整走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北平。我虽然是第一次进北平，可是，并不感到这个地方很陌生。因为，我通过报纸和朋友的介绍，一直关注着这里的革命形势。聚集在这里的进步爱国人士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这里孕育着革命的风暴和希望。

我们在前门史家胡同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刚刚安顿好了，在北平学习的张伯乔、穆松乔、赵子珍几个人就来看我们。老同学见面十分亲热。他们告诉我住在这里离蒙藏学院比较远，另外，房费也比较贵。蒙藏学院在西单附近，他们就帮助我们在西城翠花横街路东租借了一家公寓住下了。

过了一天，我送那几个学生去蒙藏学院入学。进了蒙藏学院，一个高个戴着金丝眼镜，身穿长袍的先生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说明了来意，递上了我们入蒙藏学院的证明信。那位先生看了看我的信，又斜着眼睛看

了看我们几个人，摇晃着稀疏几根头发的脑袋，很傲慢地说：

“你们怎么不象蒙古人呢？我看是太不象了。尤其是那个（指我）又很能讲汉语，我看你们还是准备到别的学校去吧。”

我听了这话，很着急地说：“先生，我们从一千多里地到这里来求学，实在是不容易啊，你不能不收我们啊！”

那位先生看我很激动，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金丝眼镜，又架到鼻梁上说：“那样吧，我和校方教务长商量一下，过些日子你们再听消息吧。”就这样，把我们支出来了。

回到公寓，几个学生都闷闷不乐，还有的学生发着牢骚，我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鼓励他们别泄气，讲了几个逗笑的笑话。

这时候，穆松乔、张伯乔，还有一个叫陈镜波的学生来了，他们问我们入学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说：“求学难啊，人家不收，我们只好坐等。”

他们几个人也劝我们别着急，过几天找个熟人给引荐一下。接着，我们就谈起了时局情况，我向他们介绍了关外被日本鬼子占领的情况，和我们一路上所见到的难民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惨状。他们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又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卖国贼蒋介石的仇恨。穆松乔他们也向我们介绍了北平等地学生派代表团到南京去请愿示威，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外交部的事件。他们讲得有声有色，非常鼓舞人心。我对他们说，我很想参加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答应我以后有活动提前通知我。

在我到北平不长的时间里，穆松乔、张伯乔和一些学生经常到我这里来。我们在一起议论过对时局发展的看法，探讨着一些政治和学术问题，他们都很赞同我对共产党政治主张的看法。

过了几天，那个叫陈镜波的学生来找我。他说，他哥哥陈镜湖要请我去吃饭。我感到有些惊讶，问他：“你哥哥是干什么的？”

他说：“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我答应了。因为这时我身上带的钱都花尽了，我心里想他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入学啊；或者是能帮助我们找个工作也可以啊。带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才同意和他哥哥见面。

我们几个人到西四的一家饭店和陈镜波的哥哥陈镜湖，还有一个叫刘刚的人见面了。吃饭前，陈镜湖询问了我们来到北平之后求学的情况，他很同情我们的处境。

他说：“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求学，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不要灰心丧气。我可以帮你们想办法，如果求学不成，可以找工作吗。”

“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呵！”

“以后会找到工作的！”陈镜湖肯定地说。

饭后，和我一起来的几个人都散去了。陈镜湖和刘刚二人又邀我出去散步，我们走到一块僻静的地方，他又详细的询问起我家乡和热河一带的情况。

陈镜湖说：“我们听说你是一位有热血、有爱国心的年青人，我们很需要你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

我说：“只要对救国有利，干什么都可以。”

从这以后，陈镜湖和刘刚二人经常找我，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些进步的刊物，又给我讲一些时局发展的情况，他说，东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惊醒了中国民众，唤起了他们的民族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已经卷入到抗日反蒋的热潮中。还说，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已经发表了对日战争的宣言，要领导工农

红军和广大民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陈镜湖和刘刚两个人的谈话，都说到了我的心上。我好象又见到了曾引导我追求革命思想的导师——乌子贞和郭皓轩一样，我相信他们就是我所需要的引路人。我向他们讲到了我多年来准备投身到革命之中去的愿望，陈镜湖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这些想法很好啊，你要积极地去做工作吧。”

我按照陈镜湖的指导，积极地参加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

过了不久，陈镜湖和刘刚二人又把我找去。陈镜湖微笑着对我说：

“王逸伦同志，根据你的迫切要求和一贯表现，组织上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你从现在起已经是我们的中间里的一员了，是我们的同志了。”

说完，他紧紧握了握我的手，刘刚同志也过来和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心情很激动。共产党，是我多年追求的一盏明灯。现在，这盏灯终于在我心中亮起来了。我能和陈镜湖、刘刚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称之为同志，我为之感到骄傲，我决心为党的工作奋斗到底。

这时，陈镜湖同志才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在大革命时期，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宋哲元的部队里任旅级干部，以后，大革命失败了，党派他到了陕西，在冯玉祥管辖的地方当过县长。冯玉祥失败后，他和党失去了联系，又到苏联共产国际找到了关系。回国后，革命已经转入了低潮。党任命他为内蒙特委书记，指导热、察、绥三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指示他扩大组织，发展党员，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古城内笼罩着白色恐怖。陈镜湖同志告诉我，反动派搜查地很紧，要注意不要暴露了身份，他已经改名叫李铁

然了。并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什么时候出发，临时通知我。

九月的一天，刘刚同志通知我和一位叫老张的同志一起到天津，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并告诉我们李铁然同志已经给上海的党组织写了信，他们会派人和我们联系的。临行时，李铁然同志也赶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他看着老张黑红的脸膛开着玩笑说：

“老张，到了上海你可别象大姑娘似的那样腼腆呵，上海有很多女同志都参加了工作，你和人家联系工作可得大方点，别露了怯呵。”

老张让他这么一说，脸唰地一下红了，自我遮掩说：

“女同志也不是老虎，我才不怕呢！”

我们从天津乘轮船出发了，经塘沽到达上海。在英租界四马路的一家名叫吉生站的北方旅馆住下了。旅馆的茶房都习惯把旅客的名字写在纸牌上，再挂到墙上，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查找方便。那时候，我们刚上南方的大城市，都没有经验。在旅馆里等着组织上派人来联系。我们两人在那家旅馆里一连等了几天，也不见有人来联系，心里很焦急。

一天傍晚，吃过饭后，我对老张说：“你在旅馆里等着，别出去。我到街上买个信封、邮票，给北平写封信，一会就回来。”

我走出旅馆不远，看见前面有一家门市部，牌子上写着“青莲阁商场”的字号。在北方门市部的牌子上写着商场的字号都是卖东西的，我就走进去了。进了屋一看，一群穿红戴绿、妖里妖气抹着口红的女人围了上来，这个女人也扯，那个女人也拽。我一看这里并不是卖东西的，这是到了“野鸡店”了，赶紧挣扎着跑了出来。

我回到旅馆，把在街里撞进“野鸡店”的事和他说了，我们俩人真是又生气又好笑。

第二天晚上，又有人来敲门。老张就去开门了。

站在门口的男人问：“这是王先生和张先生的房间吗？”

我说了句：“是。”

那个男人又问了一下我们是从哪来的，什么时候到上海，我就告诉了他，他和那个女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这回找对了。”



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我一看是李铁然同志写给上海党组织介绍我们两人情况的信，就知道这是上海党组织派人来和我们联系了。我赶紧走过去和那两位同志握了握手：

“可把你们盼来了。”

“我们来的晚一点了，让你们久等了。”

那位男同志指着那位女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她姓杨，就称杨同志吧，我姓冯。”

老张这时感到很不好意思，他那副黑红的脸膛这会红得象蒙上块红布一样，很腼腆地说：

“真对不起，刚才误会，是误会了。”

“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我们谈一谈情况吧。”杨同志很大方地把话岔开了，这才解了老张尴尬的处境。

上海的这两位同志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和应该注意的事情。然后，告诉我们中央训练班还没有开始，北方各地报到的人还没来齐，不要着急，再等几天。什么时候联系，再临时通知我们。临走时又给了我们几十元钱。当时活动经费很紧张，组织上要求每人每天按照伍角钱的标准。我们都尽量节省，从来不超过这个标准化费。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旅馆里住着，除了每天看一些书之外，为了以后工作方便我就抓紧时间学习上海和南方话。以后在训练班里确实起了作用。

又过了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组织上派人通知我们到法租界的霞飞路，到那里有人领我们去开会。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也很严重，我们去开会的地点是保密的。上了电车之后，领我们去开会的那个人告诉我们不要往外边看，下了电车又领着我们俩人转了几个圈子，才到了一家小楼的二层楼上。然后，他告诉我们，中央训练班就在这里学习。又向我们交待了几条纪律。参加训练班的人不经允许，不许随便下楼。

参加这期中央训练班的共有十几个人，大多数都是从北方派来的同志。其中陈赓将军和他的爱人也住在这里，陈赓同志在部队里打仗时负了伤，他爱人负责护理，住在这里养伤。训练班的负责人是赵大姐（赵世炎同志的姐姐），她对参加学习的同志要求的很严，待人又很亲切，同志们都很尊敬她。

训练班安排的日程很紧张，每天由中共中央的同志轮流讲课。讲课的内容有“游击战争问题”，“怎样做地下工作”，“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等等。讲课的同志大多数都是南方人，我们训练班上的同志都是北方人，他们听南方话都很吃力，北方的同志讲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幸好，我学会了一些南方话，能听懂讲的内容，在这中间起到了一个翻译的作用。

学习进行得比较紧张，这中间还有几次躲避特务的搜查。可是，在训练班上同志们对一些形势、路线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记得当时有位姓梁的同志就站出来为立三路线辩护，大家都发表意见，驳斥了他的错误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党每在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党内的路线斗争也都是很激烈的。

中央训练班将要结束时，党组织找我谈话，准备把我留在上海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分配。这时，李铁然同志到了上海，他听说组织上要把我留在上海工作，就去找组织的负责人谈话，把我又硬要回来了。

我们在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短训班结束了。同志们都陆续返回北方各地，临行时，中央负责北方工作的孔原同志和我们谈了一次话。他分析了当时时局发展的情况：在中央苏区方面，蒋介石已经动员了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形势也是很紧迫的；在东北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要占领热河一带。给我们布

置的主要任务就是，回去后发动群众，开展地下工作，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和消灭敌人，配合全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形势，任务十分艰巨。同时，组织决定我参加内蒙特委工作。

听了孔原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和布置的任务，我感到工作是很艰巨的，但是，参加这期中央训练班的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弄懂了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革命道理，更增强了我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我做好准备去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四月，我从苏联回到了延安。

这时，抗日战争进入到与敌寇相持的阶段。党中央提出了到敌人后方去，广泛持久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组织上决定从延安派一批干部到敌后开展工作，同志们都争着抢着要求到抗战的前线去。

我刚刚被分配到延安新建的女子大学当教员，看到有的同志已经准备到敌后去了，心里是又羡慕又着急。记得，在苏联殖民地半殖民地大学学习结束时，共产国际的负责人曾准备把我留在苏联，派到远东去工作。在和我谈话时，我表示服从组织上的意见。但是，国内的抗日战争多么需要人啊！我说，我愿到抗日的前线去！现在回到了延安，能不能实现我的愿望呢？

七月的一天，陈云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华北敌后去工作。我听了之后心里很高兴，真想能插上翅膀飞到华北去。

我说：“我希望能立即就出发，然后乘火车到华北。”

陈云同志向我说明了敌寇对各条交通要道封锁的情况后，他说：

“乘火车走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步下走。最快的办法就是跟着成仿吾同志带领的西南

联大的学员一起走，这个路线是最便利的了。”

我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到联大赴华北工作队报到。我们到华北敌后去的干部，同行的有五六十人，其中有三名女同志，被编成一个队，指派我任这个行军队的指导员。

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延长、清涧、绥德、米脂、郃县，又往北走，在黑峪口过了黄河，由于敌人封锁得很严密，我们只好在兴县停留待发，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出发了。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急行军，到了离同浦铁路不远的山区。为了防备敌人飞机的轰炸，天刚亮，我们就到野地里去隐蔽。秋天地里很潮湿，再加上蚊虫叮咬，在那里趴了一天，实在是够难受的了。到了晚上，我们就开始过路了。女同志跑不动，我们就轮流架着她们跑。在八路军正规部队的掩护下，冲过了敌人驻有重兵的同浦铁路封锁线，在连亘不绝的山地里整整一天一夜的工夫，连跑带走不停地行了二百多里，连一口水也没喝上，真是又渴又累，疲惫不堪。有的同志躺在地上，实在是走不动了，怎么往起拽也不起来。

到了太行山休息时，罗瑞卿同志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敌人防守严密的同浦路，前面就要到解放区了。我们丢了什么？丢了脚印子，丢了破鞋，敌人是一无所获。”

他看看我们每个人过路时手里都拿着个棍子，他说：“快到解放区了，军容要好一点，把棍子都扔了，要让解放区的老百姓看到，我们每个同志都不是熊种，我们要大踏步地进入解放区。”

罗瑞卿同志的讲话很鼓舞士气，同志们听说前面就是解放区了，都抖擞起精神来了。我们又走了不远，前面来人报告说，敌人在前面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好绕路上山走了。这天偏偏老天爷也和我们作对，

雨下得象抽风似的，下一阵停一阵，我们身上的衣服一会儿渴干了，一会儿又淋湿了，雨水把山路冲的又陡又滑。过路之前，我们每人背上两双草鞋也都穿烂了。光着脚在山路上走，蒺藜、石块硌在脚下，扎得钻心的疼，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到了晚上，我们下了山，又在沟膛子里走了一夜，天刚亮的时候，到了平原滹沱河边上了。秋天河水上涨，河水打着漩涡流的很急，河岸上渡船都被敌人烧光了。我们只好找来些木板临时搭船，渡河十分危险，木板船随时都有被漩涡卷翻的危险。我们请到了几个识水性的老百姓，在他们的帮助下，勉强的渡过河去了。

过了滹沱河，才总算是脱离了敌人十几道封锁线的严密封锁，到了晋察冀边区。

我们在平山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到了阜平西边的康家峪。当时，那里是北方局的所在地。在那里，我和前来接我们的刘仁同志又见面了。刘仁同志握着我的手说：“逸伦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我十分感慨地说：“是呀，真是革命使我们难分难舍呵！”

想起我和刘仁同志的结识还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一九三三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李铁然同志受党的指示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去组织军队。从张家口出来后，在路上被敌人暗杀了。刘刚同志到南京后就联系不上了，我这时在北京和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后来，经在四十一军的安子兴介绍，得知刘仁同志在包头一带活动，我就派穆松乔到包头和刘仁同志取得了联系。刘仁同志当时任绥远特委书记，他在张家口内蒙特委开会时，和李铁然同志有过联系。刘仁同志和穆松乔回到北京后，把我的关系转到了绥远特委。一九三四年夏到一九三五年春，我受刘仁同志的委派，在绥西河套一带开始地下工作。一九三五年四月，河套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反动派

在陕坝、临河点名通缉抓我。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到包头找到了刘仁同志和组织部长吉合同志汇报了工作。那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革命迫于反动派的围剿之中。由于党内出现了叛徒，和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刘仁同志和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经过我们研究决定，到苏联共产国际去找组织。于是，我们装扮成拉骆驼的商人，在漫长的草地里艰难地行走了一个多月，到了蒙古境地。后来，经蒙古到了苏联，在共产国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问题研究院里学习。刘仁同志在我回国之前就先回国参加抗日斗争了，在北方局任组织部长和城工部长。

在康家峪我和刘仁同志分手后，北方局党组织分配我到晋东南武乡一带巡视工作。后来，又调我到冀南区党委做农会工作，兼任工农委员会书记。

这期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在整个华北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百团大战”。以一百一十五个团的兵力同时向敌人控制的交通要道展开进攻，大规模的破坏交通和歼灭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敌人进攻西北、西南的后腿，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抗战斗志。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一方面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的“囚笼”内，配合基干军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内建立健全区、村的抗日民主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动员参军的热潮和锄奸反特运动。

“武装动员”是解放区军民的一件大事。我们经常下到各个乡村中，利用报告、讲演、演剧等等形式，广泛深入地造成动员热潮。有的村子妇女和儿童每人都自愿向抗日队伍捐赠一件礼品。涌现出了很多“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青河县就有一对夫妻，都是村政府的干部。



工委的负责人先是杨洪涛、张良翰（也叫张次平），后来是多松年，绥远工委书记是吉雅泰，以后是彭振纲、熊

味根；包头工委书记是李裕智（也叫李若愚）。这些党的组织是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指派于树德、韩麟符来帮助组建的。四个工委在各自所在地区开辟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绥远工委就设在归绥旧城（今呼和浩特市的旧城）巧尔齐召内，当时对外的公开名称是由我们党帮助组建的国民党绥远党部。在工委下面还建立起了萨县工委，书记是李瑞；和林县工委，书记是万寿；武川县工委，书记是区财旺；归绥县工委，书记是赵受恩；土默特旗工委，负责人是崇德臣、孙承业。到1926年，全工委的党团员各有三十多人。中国共产

党这面鲜艳的红旗在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呼和浩特升了起来，指引着蒙汉各族人民同封建军阀、王公进行坚决斗争。中共包头工委是设在包头台梁的一座喇嘛庙里，它领导包头及其周围蒙汉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始终把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开辟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除建立

在二十世纪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象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苦难的旧中国大地。倍遭帝国主义、封建帝国主义蹂躏的祖国内蒙古草原也迎来了曙光。

党的光辉照亮了内蒙古历史发展的进程。党成立不久，就十分关怀内蒙古地

区受苦难的蒙汉人民，为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做了不少工作。从1925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陆续成立，并直接担负起了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在内蒙古地区首先建立起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热河工委的负责人是杜真生、陆印源（也叫陈镜湖、李铁然），察哈尔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郝维民



党的教育

了上述四个工委外，在张家口又延立起一个党领导内蒙工作的中心。

在开展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同时，先在张家口建立一个党支部，王仲一任书记。1925年下半年，李大钊派肖三等同志组建了中共张家口地委，肖三任书记，江浩任宣传委员，王仲一任组织委员。1926年4月，丁之之继任书记，王仲一仍任组织委员，乐天宇任宣传委员，李怀才负责农民运动，张良翰负责国民运动，王一飞负责军事运动，卢继亭负责职工运动，形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张家口地委除了领导张家口一带的革命工作外，还负责热、察、绥三特别区的工作，不断派干部到内蒙古各地从事革命活动，从而全面展开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活动。

内蒙古地区自从有了党的组织，内蒙古的革命随之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不论是在革命高涨的时候，还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党始终关怀、领导着内蒙

古蒙汉各族人民，在荆棘丛生的征途上，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内蒙古草原换上了新装。内蒙古各族人民满怀深情地赞颂中国共产党犹如“草原上升起不落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顺直省委提出了内蒙古工作方针，分析了内蒙古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这里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蒙汉族人民团结斗争，才能得到共同的解放。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顺直省委领导下建立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由韩麟符、郑丕烈、云润、杨洪涛、卢东白、张述等组成。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扩大党的影响。

为了加强党对内蒙古工作的领导，顺直省委和内蒙特支从六月间开始，要求中央直接指导内蒙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央

号召蒙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时要求内蒙古特委加强对蒙古民族“反改省运动”（注）的领导。

一九三〇年六月，内
破坏，郑丕烈被捕。

同年十一月五日，中央指示
滿洲省委重建內蒙古特委，由李

决定将内蒙古特支改为特委，郑丕
烈任书记。并规定内蒙古民族工
作的纲领是：赶走帝国主义的势
力；推翻军阀、国民党、王公贵
族的统治；取消王公贵族的
一切特权，取消奴隶制等；

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十月二日，内蒙古特委在热河深

平壤金沟屯召开各旗
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
生了新特委，李铁然任书记。一九
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内蒙古特
委在张家口组织“蒙汉抗日同盟

军事委员会”，发表《坚决抵抗抗
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号召蒙汉
各族人民参加抗日同盟军，团结
抗日，乌兰夫参加组织工作。接
着，内蒙古特委在北京、热河围
场和张家口先后召开紧急会议，
制定工作计划，决定进一步发动
工人、农民、牧民、士兵开展武
装抗日斗争。王逸伦参加会议，
并当选为特委委员。不久，内蒙
古特委遭破坏，李铁然被土匪杀
害，特委其他成员分散各地继续
开展斗争。

注：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遭到蒙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哈拉努岱)

數藝，以藝扣擊臣求母



流服以。此中剪截自《内家书同叙》一九八二年正月（星期日）第三版右下角。
壬戌年正月十日。年119938号。

壬戌年正月十七日。第11993號。

2. 注意：归子陈境胡（已学铁器）材料为肉。

剪裁者 芝程文光 如 222